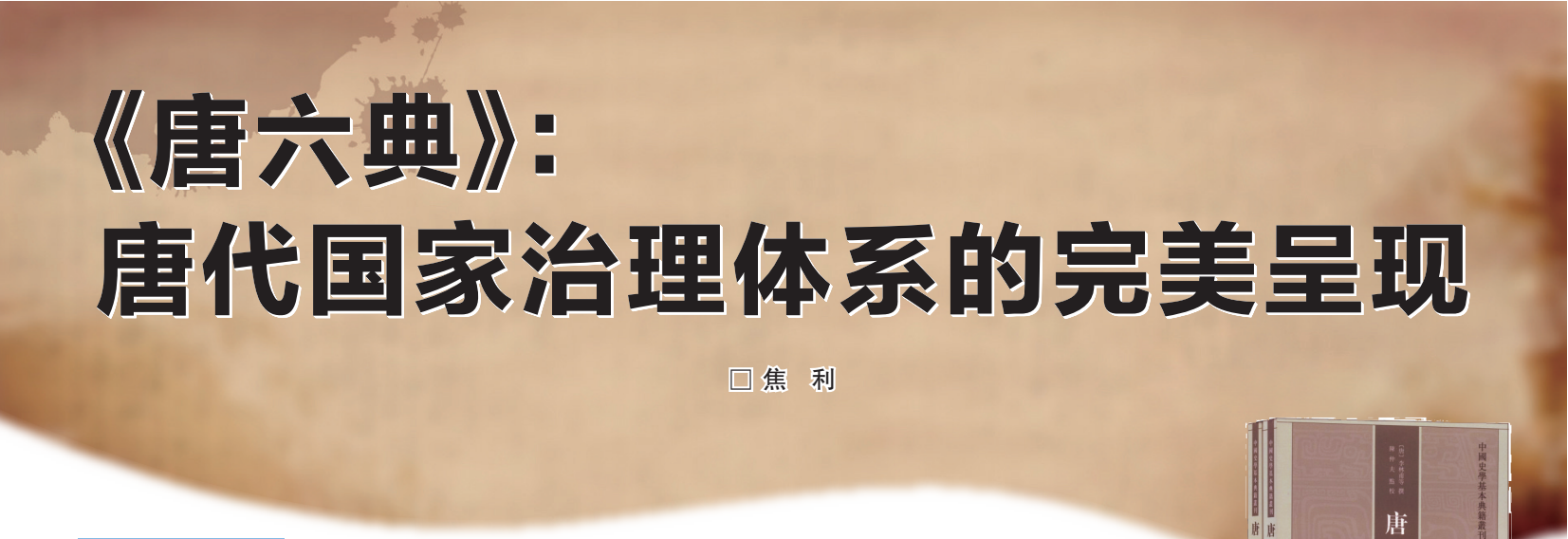




□ 焦 利

核心阅读

《唐六典》以法典编纂的形式确认、巩固和扩大了唐朝政府机构改革的成果，为后世完美呈现了当时唐朝政府的国家治理体系及其渊源，对于今天国家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盛世修典。当唐王朝步入“开元盛世”时，整个王朝的社会经济已空前繁荣，达到了强盛的顶点，国家政治体制已趋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已全面建立、健全和成熟起来。在国家的组织制度及行政管理方面，时代需要有一个相对明确且比较稳定的规范。

开元十年，唐玄宗亲笔“手写白麻纸凡六条，曰理、教、礼、政、刑、事典，令以类相从，撰录以进”。下令仿效《周礼》定制，编纂一部既实用，又能展示大唐气象的前无古人的典制巨著来。经过臣子们16年的努力，终于在开元二十六年为唐玄宗奉上了一部皇皇巨著——《大唐六典》（简称《唐六典》）30卷。《唐六典》发展并完善了《周礼》以六部为纲、设官分职的编纂之法，创构了规模宏大、纲目清楚、叙述规范的典制编纂体例，规定了唐代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的机构、编制、职责、人员、品级、待遇等，注中又叙述了官制的历史沿革，为开元末天宝初盛世景象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和法律基础。

《唐六典》是唐朝的国家机构组织法

唐朝时期，我国封建时代国家行政管理机构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由九卿时期进入尚书六部时期，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为适应历史的发展，唐朝开元时期曾有过一次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改革。改革既与当时的经济背景直接相关，也是盛唐官制调整、成熟与定型的关键一环。《唐六典》则是开元中后期各项制度变革的集大成者，它以法典编纂的形式确认、巩固和扩大了机构改革的成果。《唐六典》按照改革后的国家机关体系进行编纂，详尽规定各部门的机构设置、官员编制、职掌权限、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官吏任用等一系列制度，使大唐帝国的组织架构一目了然，相当于封建国家的组织法。按《唐六典》定制，唐朝政府各部门的组织，在中央乃是：

三师、三公：为中央最高顾问。三师即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即太尉、司徒、司空。
三师三公皆“训导”“论道”之官，“非道德崇重则不居其位”。
中书门下政事堂：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中书省主出令，门下省主审议，尚书省主奉行。中书、门下省乃是“佐天子而统大政”的决策机关。
御史台：为中央最高监察机关，设台院、殿院、察院。
尚书六部：为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尚书六部为国家行政中枢。尚书省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又分设四个司。
吏部：设吏部、司封、司勋、考功四司；
户部：设户部、度支、金部、仓部四司；
礼部：设礼部、祠部、膳部、主客四司；
兵部：设兵部、职方、驾部、库部四司；
刑部：设刑部、都官、比部、司门四司；
工部：设工部、屯田、虞部、水部四司。
此外还有九寺五监等中央政府办事机构。在地方乃是：
道：为地方监察区，全国分为10道，后来增划为15道；
府、州：为地方一级行政区；
县：为地方二级行政区；
都护府：为边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所属机构如州府之制。

《唐六典》是唐朝的职官编制法

为防止机构和冗员的膨胀，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职官编制立法。中国古代职官编制法是职官管理法的基本组成部分。开元二十三年唐政府那次大规模的机构改革成效显著：裁减冗员，撤减机构，“总定官数，裁为典制”。这次机构改革的成果在《唐六典》中有明确的体现，其卷二《尚书吏部》记载道：“凡天下官吏各有常员（开元二十三年，敕以为诸色补署，颇多繁冗，停废诸司、监、署、府十余所，减冗散官三百余员。其见在员数，已具此书，各冠列曹之首；或未该者，以其繁细，亦存乎令、式）。”其中，注文的前一句是对玄宗敕文的概括性记述，而后一句则说明这次机构精简的成果已最大限度地记入了《唐六典》。该书正文中的“见在”职官与数量，就是此次精简后中央各机构的编制全貌。

《唐六典》是盛唐官制成熟与定型的一大标志，它不仅明确了这一时期天下官员的总数，而且还首次把官员分为文官、武官、内官、外官四大类，这在此前有唐宋代官制的记载中是没有的。应该说，“凡诸司置直，

皆有定制”是《唐六典》的一大追求与特色。“定制”的重要内容就是定岗、定责、定编、定级。
例如关于地方官员的规定：“诸州上县，令一人，从六品上；丞一人，从八品下；主簿一人，正九品下；尉二人，从九品上；录事二人，史三人；司户佐四人，史七人，帐史一人（万户已上增置佐二人、史四人、帐史一人）；司法佐四人，史八人（万户已上增置佐一人、史二人，余同畿县）；典狱十人；问事四人；白直十人；市令一人，佐一人，史一人，帅二人，仓督二人；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
京畿及天下诸县令之职，皆掌导扬风化，抚字黎氓，敦四人之业，崇五土之利，养鳏寡，恤孤穷，审察冤屈，躬亲狱讼，务知百姓之疾苦……若籍帐、传驿、仓库、盗贼、河堤、道路，虽有专当官，皆县令兼综焉。县丞为之贰。

主簿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纠正非违，监印，给纸笔、杂用之事。录事掌受事发展，勾检稽失。县尉亲理庶务，分判众曹，割断追催，收率课调。博士掌以经术教授诸生。二分之月，释奠于先圣、先师。”

对中央官员的规定如：“御史台”先列“御史大夫一人，从三品；中丞二人，正五品”，然后叙其职掌：“御史大夫之职，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中丞为之贰”，最后再叙其相关的业务规章制度。这使得全书虽然规模宏大，但却条分缕析，纲目清楚。

职官编制法的指导原则就是“因职设官”“务省官员”，以便“官习其事，民安其教”。最早在《周礼》中关于官吏署员已有明确的编制，《唐六典》则是中国古代职官编制法的成熟形态。《唐六典》对政府机关的编制员额一经确立便具有法律效力，不得任意更改。据《唐律·职制律》规定：“诸官有员数，而署置超限，及不应置而置（谓非奏授者），一人杖一百，三人加一等，十人徒二年。”即如果官员超过法定人数，或不按规定的员数而任意增补官员，则主管官要按妄增的人数，负法律责任。其目的就在于维护职官编制，防止冗官充斥。

《唐六典》的历史地位

《唐六典》结束了唐朝前期行政法律规范庞杂无序，同一个部门的职守、法规，散见于令、格、式几大部类之中，征引、查找都十分麻烦费时

的局面，是开元时期政府机构改革成果法律化的重要体现。从先秦到唐初，中国的法典基本上是刑法典。《唐六典》的修成、颁布，标志着中国法制史上出现了古代刑法典和行政

法典双峰并立、二水分流之新局面。《唐六典》是保存至今一部最早的、完整的、具有封建国家行政法典性质的文献，它不仅是唐代立法活动的一个卓越成就，而且对后世行政立法的发展特别是对唐以后历代会典的编纂具有深远影响，在中国行政立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唐六典》囊括了当时国家各级政府机关的全部在编官员，将在行最常用和最重要的令、式及有关典制，分门别类地摘录、归入到中央三省、六部、九寺、五监、十二卫、东宫、后官、王府等国家机关和州、县等地方机关以及各类职官中去。这种以本朝职官为纲目、分类编纂的新体例，发展并完善了《周礼》以六部为纲、设官分职的分类编纂方法；创构了一个规模宏大、纲目清楚、叙述规范的编纂体例，让使用者一目了然，“便于省览”，实现了“其阶品有制，其尊卑有序，其名官有义……则朝廷于焉若稽，缙绅于焉矩矱，士子于焉讲究，一举三得”的目的，成为“会典体”行政立法的创始之作。其立法技术继往开来，显示出独树一帜的进步性和优越性。

“《唐六典》载古官制度，备因革，成一王书，可为后世标准”，唐以后各朝行政法典基本沿袭《唐六典》的编纂方法。在史料记载方法上，采取了不论是诏旨政令，还是行事成例，都原文抄录、保留原貌而不加增损修饰的记录方式。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指出：“盖一朝之会典，即记一朝之故事。故事之所有，不能删而不书；故事之所无，亦不能饰而虚载；故事有善有不善，亦不能有所点窜变异。”《唐六典》所创之“会典体”史籍在材料编纂上的这一特点，使这一系列的典制史籍为我们保存了相当丰富的第一手珍贵史料，它的史料价值远远超过了那些对原始材料进行综合概括后而撰成的史著。

《唐六典》以法典编纂的形式确认、巩固和扩大了唐朝政府机构改革的成果，为后世完美呈现了当时唐政府的国家治理体系及其渊源，对于今天国家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考古学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科学。由于实物资料多埋设在地下，必须经过科学的调查发掘，才能被系统地、完整地揭示和收集。虽然我国自北宋以来就逐渐兴起了金石学，但直到清代末年它仍然没有走出“探其制作之原，以补经传之闕亡，正诸儒之谬误”的藩篱，依然把古代遗物视为圣人“载道垂戒，寓不传之妙”的教化工具。

五四运动直接催生了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

强调田野调查发掘工作是近代科学考古学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它区别于传统金石学的关键所在。

1928年，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傅斯年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创办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下设有考古组，这是中国国家考古机构的首次设立。傅斯年在北大求学期间，就意识到“中国是个很长的历史文化的民族，所以中华国故在‘世界的’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言语学等等的材料上，占个重要的部分”，发愿“把我中国已往的学术、政治、社会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统的事物来，不特有益于中国学问界，或者有益于‘世界的’科学”。史语所成立之后，傅斯年以“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为宗旨，以殷墟考古发掘为突破口，立志“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执着于“为中国史学争国际的地位”。

五四运动更给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一批历史学和考古学者开始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丰富的中国史料相结合，创作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中国新石器时代》（1939）等唯物史观经典著作。

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考古学相结合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考古学真正步入黄金时代。新中国考古的两位重要的领导者——夏鼐和苏秉琦都是因为强烈的家国情怀而选择考古为毕生志业的。在接触考古学科的伊始，夏鼐便意识到“中国考古学之重要，在于以全人类的观点来观察中国古代文化教育在世界中的位置”；苏秉琦在目睹了近代中国的衰亡之后，放弃原本研习的工科，“决心改学中华民族的历史以唤醒民众——教育救国，兴史救国”，以期“让国人深知民族历史而懂得要挽救自己”。

夏鼐指出，中国考古学的主要任务是“以考古资料来阐明中国古代文明”，而“由于古代中国在世界文明史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因此“中国考古学的工作是有世界性意义的”。对于考古学在新中国的发展方向，夏鼐也旗帜鲜明地强调，“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的中国考古学当然要贯穿一条马克思主义的红线”。同样，苏秉琦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呼吁考古同行们要把“由西方新学来的一套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生根繁殖”，努力把考古工作建设成为“人民的事业”。他呼吁考古同行们向先进史学家学习，不仅要详细占有史料，更要有正确的史观引导，实现从“为考古而考古”到“为历史而考古”的转变。

但是，科学探索的道路并非都是坦途。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尹达号召北大考古专业的师生“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考古学体系”，大家都备受鼓舞。作为构建这一学科体系的具体举措，苏秉琦等北大考古专业师生们开始着手编写中国考古学系列教材，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书虽然按时写成了，但由于把社会发展规律当成历史本身，把一般的社会发展规律当作教条，与考古材料简单比附对应，结果是大家都不满意。为此苏秉琦陷入了长期的思考——“怎么样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学科结合起来”？

苏秉琦的学术“顿悟”

1975年，受胡绳一个学术报告的启发，特别是结合他自己的考古学实践，苏秉琦获得了学术上的“顿悟”，尝试性地提出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中国考古学”。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苏秉琦更是明确宣布，“在国际范围的考古学研究中，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学派，开始出现了”。换句话说，



□ 孙庆伟

“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社会历史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考古学已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开始成为现实”了。

考古学“中国学派”的形成，是新中国考古学的最大成就。但苏秉琦并不盲目乐观，他深知这个学派的核心有二，首要一点是“用马克思主义占领这学科”，但“用这标准来衡量我们学科现在的发展水平”，“说马克思主义太少了一些”；其次一点，是要能够“反映出我们国家历史，民族文化特点”，拿这一条来衡量学科水平，同样是“远远不够”，甚至是“起码要求也不够”。

20世纪80年代，已经步入老年阶段的苏秉琦深感时不我待，为加强考古学的“中国学派”建设而四处奔波和大声呼吁，爆发出学术上的第二春。他积极倡导“建立新的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通过它来阐明中国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并以它为骨骼系统复原中国历史的真实轮廓”。苏秉琦高屋建瓴地指出，“知我中华”是中国考古学的当代使命，是“振兴中华”大业对考古学科的时代召唤，是五千年文明古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灵魂和精神源泉。

开创考古学“中国学派”的新气象与新格局

如今，距离苏秉琦的“顿悟”已经过去40多年了，距离苏秉琦逝世也超过20年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当今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中国考古学就有如日光下的一滴水，既映照出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的辉煌，也饱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注重系统阐释中华古老文明的时代新义与当代价值，努力开创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中国学派”的新气象与新格局。



落实立德树人关键在抓好思政课

□ 刘自康



立德树人是高校的立身之本，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首要任务是要抓好思政课。提高思政课教学质量。“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提出的“八个相统一”的要求，引导学生增强“四个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思政课是一门科学，讲好思政课却是一门艺术。要切实推动思政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抓好思政课教学关键环节，打好思政课教学质量攻坚战。现在的大学生正值“拔节孕穗”期，他们渴望真理的力量，渴望理论的魅力。我们的思政课要能够把有意义的事讲得有意思，把大道理变成生动的故事，发出的声音更具道义感召力和思想穿透力，这样才能打动

人、影响人和改变人。

学校教师应当好理论的传播者，做好理论的研究者，潜心问道，努力站在学术最前沿，把最新的研究成果融入课堂教学之中，提高课程的吸引力和学生的学习兴趣，让思政课堂“火”起来。言传身教要统一，要行不言之教，要塑造学生的灵魂，教师首先要

有高尚的灵魂。思政课教师既要在课上讲好课，也要在课下答好疑，要直面学生思想上随时出现的困惑；既要在网下与辅导员队伍打好融合牌，也要在网上成为专家亮好剑，及时回

应社会事件。
强化思政课大格局意识。党委要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有关部门

各负其责、高校上下协同配合。学校